



《伤寒杂病论》：中医药学的源头活水

□ 畅洪昇

宋代理学家朱熹曾有一首诗写到：“半亩方塘一鉴开，天光云影共徘徊。问渠那得清如许？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在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学术领域，用源头活水评价《伤寒杂病论》可谓十分恰当。该书蕴含的深刻辨证思想和精湛处方技巧，不仅是对汉以前中医药医疗实践经验的全面总结和升华，同时也成为以后将近2000年中医药发展的轨迹。清代官修著作《医宗金鉴》曾这样评价它的价值：“有法有方，诚医宗之正派，启万世之法程，实医门之圣书”。

（一）

《伤寒杂病论》的作者是张仲景。张仲景，名机，南阳郡涅阳人（河南南阳市邓县穰东镇）。《伤寒杂病论》成书于东汉建安年间，大约公元206年前后。东汉末年，战争频繁，疫病流行，加之当时的医学界缺乏疫情危机的医疗应对能力，导致死亡者甚多。在《伤寒杂病论》序中，张仲景也提到族人“犹未十稔，其死亡者，三分有二，伤寒十居其七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张仲景本着对生命的无限珍视和为医者的强烈责任感，通过勤求博采的治学方法，有机整合了前人的思想理论、诊治方法和用药经验，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，完成了这本旷世著作。

《伤寒杂病论》共16卷，分为两部分，包括伤寒10卷，杂病6卷。令人遗憾的是，该书问世后不久，随着张仲景的逝世，加上世事不宁，遂致散乱流失。虽然到了晋代，太医令王叔和曾加以搜集整理，但总体看来，宋以前该书流传显晦分合不一。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曾感叹道“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而不传”，并留心寻访一直到晚年。

北宋嘉祐二年（1057年）官府设置校正医书局，治平年间，林亿等人奉命校正医书，以“百病之急，无急于伤寒”，先校订《伤寒论》，共10卷，22篇，397法，112方，于1065年颁行于世，成为宋之后的定型化版本。随后，根据北宋翰林学士王洙发现的《金匮玉函要略方》中下卷校订杂病部分，命名为《金匮要略方论》（简称《金匮要略》），共计3卷，25篇，载方262首。从此，根据所记述内容的侧重点不同，《伤寒杂病论》一分为二，即《伤寒论》《金匮要略》。

（二）

《伤寒论》主要论述了外感疾病的诊疗方法，伤寒是一切外感热病的总

称。但今天看来，该书独特的价值更在于其对整个中医临床药物治疗产生的重大影响，这与书中建立的六经辨证论治体系密不可分。六经辨证论治体系包括疾病加于人体以后的六经病脉证，主要的病理要素及其转化，相应的治法、方药，以及药物的剂量、炮制方法、煎煮方法、服用方法、药物的随证加减变化和服药后的反应、调护等。这种缜密、规范的诊疗程序，体现了中医学的严谨科学精神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六经辨证论治体系是中医方法论的开端和诊疗思维的发源。以此为基础，通过十几个世纪人类生命进程的观察，中医形成了对疾病发生发展规律和特征的多种认知方法，并通过不断的实践总结，最终整合在六经辨证论治体系之中，成为研究生命科学和疾病治疗的重要依据和思维工具。直至清代著名医家、绍派伤寒创始人俞根初提出“以六经钤百病，为确定之总诀”，最终确立了《伤寒论》六经辨证论治体系还蕴含着丰富的辨证法思想。它以阴阳为总纲，结合表里、虚实、寒热，对疾病的发病特点和转化过程进行了动态的概括，既坚持了病脉证治的原则性，又发挥了随证治之灵活性，从而更能有效地指导着医疗实践。

《金匮要略》同样采用了条文记述形式，以及病脉证治的辨治思想，先论疾病和脉证，后论治法方药，最后列出煎服方法。全书对40多种疾病的诊治进行了阐述，其中一些疾病的分析较之《伤寒论》更为系统、详细，鉴于其巨大的影响力，一直以来被视为中医内科、妇科的核心和基石。此外，《金匮要略》中提出的一些重要的治略思想对中医学影响很大。比如，明确疾病先后发病规律基础上的治未病观，以及“元真通畅，人即安和”的健康理念，至今仍启发着我们对健康—亚健康—疾病进程，以及纵深性药物干预策略的思考。

（三）

《伤寒杂病论》的另一个医学成就就是建立了以经方为核心的方剂体系。经方具有药物简洁、法度严谨、疗效确实的特点，是东汉以前中医临床药物治疗的标志性成就。1800多年后，在2018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《古代经典名方目录（第一批）》中，出自《伤寒杂病论》的方剂仍占28%。由此可见，到目前为止，被广为应用且行之有效的方剂，仍首推《伤寒杂病论》中的经方。在中医学漫长的发展过程中，很多临床常用的方剂都是在经方的基础上衍生、发展而来。因此，《伤寒杂病论》所载经方又被后人称为群方之祖，或祖方，它们不仅经受了长期的实践检验，而且能与时俱进，不断地展现出新的生命力。此外，《伤寒杂病论》所载的经方蕴含着丰富的治法，后人将其概括为：汗、吐、下、和、温、清、消、补，统称八法。《伤寒杂病论》将辨证、治法、经方三者有机地融合于一体，成为了中医学史上第一部理法方药完备的治疗学著作。

《伤寒杂病论》成书以后，备受世人重视。对该书的研究，始于晋唐，兴于宋元，盛于明清，这期间不仅汇集了专门的研究队伍，形成了专门研究张仲景《伤寒论》的伤寒学派，还产生了众多的中医学独特研究方法，包括：考证、注解、汇补、汇通、临床等，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中医药理论和临床的发展。此外，该书的影响也远及海外，特别是在日本，还形成了专门的研究学派——古方派。可以说《伤寒杂病论》始终是中医学研究最活跃的领域，也是推动中医学学术发展的重要核心之一。



中华古典医籍



□ 张家勇

教育扶贫应久久为功

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，我国将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减贫目标。一些人以为，2020年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后，贫困问题基本解决了，扶贫工作应该歇口气了。显然，这种想法既不成立也要不得。绝对贫困人口问题基本解决了，相对贫困人口、低收入人口仍将长期存在。另外，贫困村出列、贫困县摘帽的标准是贫困发生率降至2%以下（西部地区3%以下），即便出列摘帽绝对贫困人口也并未完全消失，扶贫不可能一劳永逸。

脱贫攻坚阶段，主要是产业扶贫、易地扶贫、光伏扶贫、电商扶贫、行业扶贫、生态扶贫等，重点是物质扶贫、经济扶贫，聚焦基本生存保障，教育扶贫的主体作用和治本价值还有待进一步突出。全面小康后，扶贫对象、范围、方法、内涵等都将发生转变，教育扶贫必将成为扶贫的支柱性关键力量，发挥“扶志”“扶智”等更加核心的主体作用。

教育扶贫的新坐标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“脱贫攻坚不是终点，而是新生活、新奋斗的起点”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，扶贫战略和工作体系都将转型。

扶贫对象的转变。教育扶贫将从以绝对贫困人口为主转向以相对贫困、低收入人口为主。比如16周岁以下农村留守儿童、义务教育阶段随

迁子女、特殊教育学生等是教育扶贫的重点对象。还有农民工、退役军人、结构性失业者、残疾人等也很需要教育助力发家致富。

扶贫内容的转变。教育扶贫将从区域性贫困为主转向以个体贫困为主，这些贫困人口不一定集中连片在国家级贫困县、“三区三州”、农村地区等特定区域，而是分散在各地。

扶贫方式的转变。教育扶贫将从物质贫困为主转变为精神贫困为主，从长期贫困转变为短期贫困为主，从资源制约型贫困为主转变为能力约束型贫困为主，从学会生存为主转向学会生活、学会发展为主，从借助外力帮扶为主转向激发内生动力为主，从以义务教育阶段“控辍保学”为重点转向提供公平的入学机会、提供个性化教育服务、提高就业能力和学习能力为主。

教育扶贫的主攻方向

从源头筑牢“控辍保学”的防控堤。“控辍保学”是教育扶贫的底线目标，是教育扶贫工作的“重中之重”。要建立“控辍保学”预防控制体系，做好早期监测预警工作，关口前移从源头进行防控。一方面，补齐农村教育短板。很多辍学是“教育自身贫困”造成的后果，当下教育的最大短板是农村教育，尤其要重视提高老少边穷地区农村教学点教育质量，丰富教育内容和形式，用心滋养孩子心灵，让所有孩子在起始阶段养

七里山塘：一半是河，一半是街

□ 张永祯



西，缓缓流淌，波光粼粼。从河的东段来看，民居大多都是临水构筑的水榭和水阁，因为在水中长时间的浸泡，许多水印都已爬满了砖墙，一道一道的，一块一块的，痕迹生动。而河的西段则显得比较疏朗开阔，桃红柳绿，芳草依依，蒹葭苍苍，风光旖旎。

沿河缓行，我们可以不停地见到水面上横跨的古桥或平或拱，或单孔或三孔。据说山塘的桥有“横七竖八”的说法。即横躺在山塘河上的桥有七座，山塘桥、通贵桥、星桥、彩云桥、普济桥、望山桥和西山庙桥；竖立在山塘街上有桥八座，白姆桥、毛家桥、桐桥、白公桥、青山桥、绿水桥、斟酌桥和万点桥。它们一个个就像从小巷深处走出来的江南女子，如一阵春风掠过河面。这些桥不仅连接着现在到未来，也连接着现在和过去。

听说通贵桥比较有名，我们主动提出下船，专门探访了这座单孔石级拱桥。据《升平笔记》记载：“山塘吴文端公一鵬与菩提庵前郭方伯某友善，朝夕过从，造桥以便往来，名曰通贵。”就是说明代官至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的吴一鵬，虽位高权重，却重情重义、礼贤亲朋，专建一桥，方便对岸好友方先生往来唱和，也方便了乡里乡亲的人来人往。人在桥上走，水在桥下流，情在两岸生，所谓“通贵”，也许就是接通珍贵的友情、联通宝贵的乡情和融通可贵的人情，如此属意民情也属难能可贵。他的故

（二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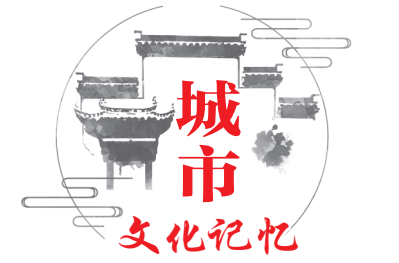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刚进入三塘街，就看到码头近在咫尺，正好有船待客，便先登舟前行。正在眼前的小桥流水，鳞次栉比的白墙灰瓦，两边枕河人家都是前门沿街、后门临河，既古典又现代，既现实又浪漫，这些都顺理成章地囊括在整个水道之中。一河春水，碧绿清澈，就像一块无瑕的翡翠，由东向

打开，就可以边喝茶边看戏，“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”。我们原以为这个古戏台是土生土长的，没想到原来是移花接木的成果。当年在对古街进行修复的时候，直接把原在东汇路的清代安齐王庙内的古戏台搬迁到这里，就像街上应该拥有剧场、电影院一样，古戏台移建到此，非但没有丝毫的违和感，还好像是为此量身定做，恰到好处。

明朝末年，宦官魏忠贤掌权，依附者助纣为虐，其中就有苏州巡抚毛一鹭，他秉承魏忠贤的授意，盛气凌人，残害忠良，下令抓捕了周顺昌等东林党人。苏州人民怒不可遏，义愤填膺，颜佩韦、杨念如、马杰、沈扬、周文元等挺身而出，率众抗暴，最终被毛一鹭以莫须有的罪名，残忍杀害。五人牺牲后，苏州百姓把他们的义骨埋葬在山塘街上，立碑大书“五人墓”，其时文人张溥挥笔写就《五人墓碑记》。从此以后，“凡四方之士，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，斯固百世之遇也”。

这条街上还有许多会馆，泉州会馆、绍兴会馆等。会馆是中国明清时期都市中由同乡或同业组成的团体。这里商贾云集由来已久，许多商人白天各忙各的，忙得不亦乐乎，但到了晚上，他们会聚集到一起，喝喝酒，品品茶，聊聊天，谈谈生意的情况，共同商讨对策，也可以拉拉家常，谈谈对家人和家乡的思念，这些会所也因此成了他们寄托乡愁的地方。

尽管在我们已身处网络时代，但这里多年来的保护性修复，还是充分地再现了七里山塘的繁华。“我与春风皆过客”，欲走还留情意浓，蓦然回首，看到风尘仆仆的人们，仍然徘徊在老街的沉醉中，放开身心，放松心情，放飞遐想。



城市文化记忆